一、水深火热中的湖南农民

湖南，地处祖国长江中游、“八百里洞庭”的南面，有着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湘、资、沅、澧四水流贯全境，东、南、西三面环山而向北敞开，形成为一个马蹄形盆地，是一个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物产丰盈的“鱼米之乡”。可是，在那“百年魔怪舞翩跹”的旧社会，这里却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广大劳动人民，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

那时，帝国主义在中国横冲直撞，各派军阀连年混战，贪官污吏鱼肉人民，地主豪绅敲骨吸髓。“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①

在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眼里，中国是一块肥肉，他们穷凶极恶，千方百计想把这块肥肉吞下去。沙皇俄国早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就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犯。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在中国干下了无数的罪恶勾当。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英、法、美、俄、日、德等资本主义国家，用洋枪洋炮敲开中国大门，

①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强盗们一批一批接踵而来，肆无忌惮地侵犯和践踏我国的领土和主权，剥削和压迫我国人民，罪行累累，罄竹难书。

湖南同全国各地一样，一直是帝国主义魔爪掠夺的地方。早在鸦片战争前后，外国的商品和鸦片，即通过广东、广西进入湖南。一八九九年，湖南水陆交通要地岳州（现岳阳），首先被英国开埠通商。随后，长沙、湘潭、常德等地，相继被日、美、德等国辟为商埠和轮船寄港地。帝国主义列强攫取了湖南海关税和对外贸易大权，控制了湖南的邮电交通事业。挂着米字旗、膏药旗、星条旗的洋船，就象湖鸭子一样，涌进了洞庭湖和湘、资、沅、澧四条内河。各种洋货，如潮水般涌入湖南城乡。湖南人民辛勤劳动生产的棉、麻、丝、茶、桐油等农产品，水口山、锡矿山的铅、锌、锑等贵重矿砂，以及湘绣、夏布等特产，又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源源流出国外。湖南逐渐沦为帝国主义倾销商品、榨取原料的市场，一湖四水成了帝国主义在湖南土地上的吸血管。

帝国主义分子在湖南飞扬跋扈，横行霸道，残酷地压迫着劳动人民。他们逼走居民，霸占土地，建立领事馆、洋行、别墅和果园。在长沙湘江中的水陆洲上，他们霸占的土地，地界很多都是直抵东西两侧的河沿，水陆洲被割裂成若干横块，不留道路给洲上的菜农南北通行。枯水季节，菜农还可绕河滩行走，到了涨水季节，那就只有望河兴叹了。帝国主义的军舰和轮船，在湖南的江河里耀武扬威，肆意撞沉民船，溺毙人命。他们的教堂遍布各地，很多妇女被他们骗去入教，惨遭蹂躏。

帝国主义还利用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培养留

学生等手段，对湖南进行文化侵略。原湘雅医学院的开办者美帝国主义分子胡美，回国后写了一本名叫《道一风同》的书，用中文在书面上写了八个大字：“攻城为下，攻心为上”，赤裸裸地供认了他们在中国开办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真正目的，是要奴化中国人民的思想，并为他们侵略中国培养一批驯服的走狗。

帝国主义者为了保存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官僚军阀等上层建筑力量，纷纷以大量的贷款、军火，大批的军事顾问，分别支持自己所豢养的封建军阀，进行无休止的混战。湖南地当军事要冲，北洋军阀以湖南为攻占两广的据点，南方军阀以湖南为北进的阵地。因此，南征北战，湖南成了长期拉锯的战场。反动军队在这里派夫派款，烧杀淫掠，无所不为。一九一七年冬至一九一八年间，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从日本政府获得两万万日元的卖国借款，在日、美帝国主义的怂恿和鼓励下，他决计实行“武力统一”政策。结果，南北军阀在湖南境内混战，弄得满目疮痍。醴陵在呈请赈恤时说：南军撤退前，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夕，首将城中财货钱帛，掳掠一空。复将房屋桥梁，烧毁殆尽。杀伤遍地，血肉成丘。”随后又从城市转向乡村，乡村“所有庐舍，大半被毁”。农民的衣服被帐、田畜家禽，几乎全被掠夺。“且杀掠之余，继以淫逼”。军阀混战给广大湖南人民特别是农民所带来的痛苦，由此可见一斑。

农民头上三把刀，
税多、租重、利息高；
农民眼前三条路，
逃荒、讨米、坐监牢。

这首民谣，也是旧社会湖南农民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

军阀政府如狼似虎，横征暴敛。从一九二〇年以后的五六年间，在军阀赵恒惕的统治下，湖南田赋的正税已是不轻，而更苛重的则是“田赋附加”。这种附加，往往超过正税数倍。宁乡县每一两银的正税（约相当银元一元多），附加学捐、团防捐、路股捐、农村保护捐共达四元。祁阳县每两竟附加十八元之多。不仅如此，军阀政府还要预征田赋。一九二六年，很多县已预征到一九二八年，有的甚至预征到一九三四年。为了残酷地搜刮民脂民膏，他们还继承了清朝政府的厘金制度。洋货入口，抽税百分之五，运销内地各省，再缴百分之二点五的所谓子口税，此外不抽任何厘金。而中国人自己经营的货物，则要受层层厘卡的剥削，连肩挑小贩，每到一卡，也要抽税。有时一担货要完三担货的税，叫做“两担空，一担实”。岳阳县有个小贩，运了一小木船萝卜，厘卡要征收高出卖价一倍的税款，且拖延时间不给过秤，以致萝卜通通糜烂变质。这个小贩气愤已极，投河自杀了。此外，还有什么屠宰税、烟酒税、土硝税、落地税、亩捐、猪捐、牛捐、鱼捐、蛋捐、窑捐、竹木捐、石灰捐等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这些奇重的苛捐杂税，都直接或间接地落在农民头上。

毛泽东同志指出：“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①

①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湖南地处祖国内地，封建经济比沿海各省有更加深刻的基础。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途径是收取地租。湖南各县，地主夺去佃农劳动果实，一般是五成至六成。长沙、湘潭等地，往往高达七成。湘乡县在丰年时，有的地主竟夺去九成。至于大斗收租，小斗粜出，几乎是通例。湘东、湘中、湘北一带的地主，怕佃农欠交租谷，还兴了一种要先交押规钱（即押金）后进庄耕种的办法。押规金额约相当一年租谷的价款。佃约规定：“如租不清，将规扣除，退田另佃。”地主得了押规，又把它转化为高利贷资本，反复剥削农民。当佃户把田种肥，谷产增多的时候，地主又借故提出退佃的要挟。如果农民要求续佃，就得加租换约。浏阳西乡一地主，只有七十五石原租，经过四年加租换约，竟升到租谷一百石。此外，地主剥削农民，还有很多花样，如规定佃户要给他挑水、晒谷、舂米、送信、讨帐、抬轿以及婚丧嫁娶帮工等无偿劳役，并要随呼随到。有些地主还责令佃户把豆子、红薯、花生、鸡鸭等，优先送他，逢年过节另要送礼，等等。他们竟把这种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说成是什么“东佃亲如一家”“东佃如父子”,东家是佃户的“衣食父母”。

地主剥削农民，更为毒辣的是高利盘剥。许多农民迫于生活，只好向地主借贷。借钱，月息百分之十，是全省的普遍现象。慈利、永明（现属江永）、城步等县，月息都是百分之三十。临湘有的地主，规定每日每元利息一角，每满十天即算复利。这样，本加利，利滚利，满一个月须还本利八元。借谷，是借陈还新，即青黄不接时借谷，新熟时归还。一般是借一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还一石半；有的借一石还两石，叫做“对本对利”。还有许多农民，为济燃眉之急，只得在新谷尚未登场时，向地主预卖新谷。地主则乘机卡着农民贱价出卖。到第二年荒月，他们又故意闭粜，制造粮荒，抬高谷价，农民只好忍痛以高价乞粜。这样，农民以一元多钱一石谷卖给地主，一转手，又以三四元钱一石买回来，吃一石花了两三石。这真是“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补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

封建地主阶级之所以能够剥削人民，是因为有封建政权为他们撑腰。封建政权是地主阶级压迫工农、吮吸人民膏血的工具。官吏与豪绅串通一气，狼狈为奸。地方官兵经常下乡骚扰，催粮逼款，勒索民财，农民说：“巡警丘八一下乡，黎民百姓定遭殃。”地主豪绅依仗衙门势力，夺产霸妻，为非作歹，任意宰割百姓。在封建制度的桎梏下，农民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你上诉吗？可是，“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以耒阳为例：人们要上诉，先得向衙门收发处买一张状纸，花高价请人书写，再出钱找铺保盖章，方可送入衙门。待传票发出，警备队便向原告要“酒钱”；到了原告家里，除鱼肉烟酒招待外，还要“草鞋费”。审讯时，差吏要“站堂费”，等等。要花钱的事，农民怎能赛过地主豪绅！何况当时的法律是反动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是保护地主阶级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的，农民有理也会被判成无理，最后不免落个破产、坐牢甚至冤屈而死的结局。更为严重的是，地主豪绅无法无天，各霸一方，私设刑堂，任意打骂和残害贫苦农民。农民往往因交不清租谷，还不完欠债，惨死在他们的竹索、木架、站笼、虎头钩、火叉、

水牢、溺人桶等野蛮残酷的毒刑之下。

宗法制度是封建统治者压迫农民的重要工具。其中最主要的是家族制。各姓都有宗祠，宗祠下面有支祠。各族各祠门口，挂着“修其祖庙，教以人伦”的对联，设有族长，这些人本来是族中的土豪劣绅，他们利用所谓族法家规，残酷地统治本族农民。农民迁移、嫁娶、买卖或典当土地等一切重要事务，都要有族长到场作主。他们气焰嚣张，可以随意给本族农民加上伤宗辱祖的罪名，施以打屁股、坐牢、沉潭、活埋等肉刑或死刑。

反动统治阶级为了巩固他们的阶级专政，总是一面用暴力镇压革命人民，一面用封建思想麻痹广大群众。当时，湖南各地神庙林立，迷信流行，佛教道教泛滥成灾；卜卦、算命、测字、看相、扶乩等邪门左道，遍及穷乡僻壤。各县都有孔庙，长沙还有孔教会、孔道中学。他们把孔丘捧为“至圣先师”，推行复辟倒退的儒家思想，鼓吹“三纲五常”、上下尊卑的孔孟之道，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天命观，妄图使劳动人民听天由命，不要造反。军阀赵恒惕在他的家乡用巨款修建了一座庙宇，竖起孔老二的牌位，可是，在这庙宇的后面，就是他私设的牢房，被他关押吊打过的农民竟达三百余人，充分暴露了这个尊孔派的刽子手面目。

反动阶级竭力维护着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又严重地阻碍和破坏着生产力的发展。那时，农民受帝国主义、军阀、地主的残酷剥削，地皮也被他们刮薄了。土地贫瘠，塘坝失修，一遇水旱灾害，毫无抵御能力。一九二〇年，湖南在兵灾之后，又遭歉收，谭延闿、赵恒惕政府竟不顾

人民死活，将谷米一百五十万担外运，充作军饷，以至第二年夏，全省大饥，蔓延到二十多个县，饥民多至六、七百万人，饿死二百余万。继大旱之后，一九二二年又发生二十多年所未有的大水灾，滨湖十余县，共倒溃两百多个垸子，致使很多农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不少农民在贫病交加，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忍痛卖儿鬻女。宝庆县农民张玉云，在一九二五年遭旱灾后没有收成，地主李斌卿却逼他交租还债。张玉云夫妇被迫把十二岁的女儿翠妹，卖给李斌卿做丫头。李逼张玉云夫妇写的“卖女契”规定：“自卖之后，任凭斌卿抚养，概不许张姓接送往来。如有伤风病痛，各安天命；倘或因责骂逃走，悬梁自缢，概不与张姓户族及玉云夫妻相涉；日后另行改嫁，凭买主所为，卖者不得异论。”这就是说，张翠妹被卖以后，就成了李斌卿的奴隶，以后被打骂折磨死了，或当作商品卖了，父母和其他亲人都不能过问，而且再不能见生身父母一面了。

在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和奴役下，辛勤劳动的农民，却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生活。他们吃的是“糠菜半年粮”，有的甚至“禾镰上壁，就冒饭吃”，靠吃树皮、蕨根、苦菜、蒿子和竹笋等充饥。攸县的农民就曾吃过三十多种野生植物，有的饿得实在没法，只好吃“观音土”①。他们穿的是“厚的地方千层补，薄的地方肉露身”。寒冬腊月，没有棉被盖蓑衣过夜的，也是四处都有。平江农民说：“吃的薯拌菜，穿的露见背，困在门板上，冬天抱秆（即稻草）盖。”

广大农民过着缺衣少食、饥寒交迫的日子，而那些狠毒的军阀，贪婪的地主，却过着花天酒地、骄奢淫逸的糜烂生活。“富

人一席酒，穷汉半年粮”的现象，比比皆是。衡山县一个地主叫符杰，每天吃胀了肚皮，不得消化，就叫丫头替他摇“人工消化器”。安仁大地主陈锡南给他老婆买一件金丝毛衣，就用了三百两银子。面对这种吃人的世道，农民们愤愤不平地说：“锄头我不拿，世人都饿死，拿起锄头来，饿死了自己。”

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湖南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不甘心做牛做马，任人宰割。他们曾多次地英勇起义，武装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的统治。在鸦片战争时期，湖南就有数千人开赴广东，抗击英国的侵略。太平天国的火焰，燃遍整个湖南城乡，大批的农民、手工业者、城市平民者，投入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反封建斗争。具有这种大规模的革命斗争，仅二十世纪头十年，就有多次。一九〇六年十二月，浏阳、醴陵和江西萍乡的农民和矿工数万人，在广大农村举行大规模武装起义，并迅即影响到宜春、万载等县。清朝政府忙从江西、江苏、湖南、湖北调集一万余人的军队进行镇压，日、英、德、美等帝国主义也派军舰驶抵岳州，企图进行武装干涉。起义军与清军相持达一月之久，最后被镇压下去，被杀者达万人以上。

浏醴萍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但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素称湖南“粮仓”的滨湖地区，一九〇九年发生大水灾，不少地方颗粒无收，官绅地主、投机商人乘机牟取暴利。平常米价每石不过二三千文，而一九一〇年三月，骤涨至每石八千文左右。四月十一日，长沙南门外卖水为生的黄贵荪，以他当日卖水所得的八十文，着他妻子去买一升米，店主说这八十文中杂有不

通行的钱币，拒不出售。傍晚，黄妻凑足八十文通行币，再去米店时，每升米又涨了数文，仍未买着。她气愤已极，投水自溺了。她的丈夫感到无法活下去，拉着自己的子女一起投河自杀了。这件惨事，当晚传遍全城。十三日，反动政府又逮捕了所谓“领众滋事”的木匠刘永福，饥民们忍无可忍，于是，一万余长沙饥民和流落在长沙的湖南、湖北的灾民，一齐拥向巡府衙门，锯断了旗杆，捣毁了照壁和石狮子，并在一夜之间，将城厢内外各处堆栈和碓房的米，全部抢光。第二天，饥民们焚烧了巡抚衙门，并捣毁了帝国主义在长沙的洋行、栈房。十五日，反动政府调兵遣将，英、美、日、德、法等帝国主义，从汉口、上海等地派来十余艘军舰，穷凶极恶地进行镇压，暴动的饥民被杀者不计其数。在长沙饥民暴动的影响下，宁乡、益阳、湘潭、浏阳、醴陵、湘阴、岳州等地，都发生了群众性的饥民“抢米”风潮。然而，同长沙一样，都先后被强大的反革命武装镇压下去了。

此外，在这二十世纪头十年中，还有衡州（州治在今衡阳）和辰州（州治在今沅陵）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利用教会压迫人民的斗争，宝庆贺金声组织军队起义，等等。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湖南农民和全国人民一样，进行了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但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所有的农民革命斗争都归于失败了。历史的经验证明：农民的革命斗争，必须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取得彻底胜利。

二、革命火种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① 接着，中国爆发了标志着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② 从此，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党成立后，为了增强本阶级的组织力量和阶级觉悟，首先集中力量开展工人运动。毛泽东同志以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的身份，于一九二二年领导了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工人、粤汉铁路工人、水口山铅锌矿工人以及长沙泥木等各行业的工人，胜利地举行了十多次罢工斗争。这些罢工斗争，锻炼了工人阶级；同时，也为湘区革命群众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培养了骨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列宁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曾对东方共产主义者指出：“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

①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②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①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中，非常杰出地完成了这个“困难而特殊”，同时又是“特别崇高的任务。”他一贯重视农民问题，把农民的问题放到战略地位的高度，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为根本出发点，而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早在青年学生时期，他就多次进行农村调查。一九一七年，他曾利用暑假，在长沙、宁乡、安化、益阳和沅江五县的广大农村，步行九百多华里，历时一个多月，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一九一八年他开始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二年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指出：我们是农夫。我们就要和我们种田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以谋我们种田人的种种利益。 ② 他号召工人、农民、学生、教师、妇女等分别组织起来，以结成一个民众的大联合。但在这一大联合中，必须以工人、农民为主体，才能获得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同志成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以后，一九二一年夏初，他又在洞庭湖滨的岳阳、华容、南县、安乡、湘阴等县，进行了大规模的农村调查。党成立以后，在他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的国文课中，特别讲授了《告中国的农民》一课。课文详细地分析了湖南农村各阶级的社会经济情况和土地日益集中的原因，指出农民要摆脱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只有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一九二三年四月，毛泽东同志派

①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②转引自《史学月刊》一九六四年第十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初期的农民运动》

遣水口山工人中的共产党员刘东轩①、谢怀德②等同志，回到他们的家乡衡山岳北，开展农民运动。我们党所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就是在工人运动的基础上，首先从衡山岳北开始的。

我国五岳之一南岳衡山的北麓，一般称为岳北。岳北的白果，是湖南军阀赵恒惕的老巢。这里的土地财产，几乎全为赵家的官僚和地主所掠夺，农民直接遭受赵恒惕的剥削和压迫。在这里开展农民运动，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同时，这里破产的农民，往往跑到安源或水口山当矿工。这个条件，造成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天然的联系，有利于他们结成亲密的联盟，以反抗共同的敌人。安源和水口山罢工胜利的消息，很快地传到了岳北，岳北的农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鼓舞。他们在党的教育下，在刘东轩、谢怀德等同志的帮助下，互相串连，暗中活动，并仿效水口山工人俱乐部十人团的组织方式，以十家雇农、贫农、佃农或自耕农，组成为一个小组，公举一个“十代表”。经过半年的积极工作，组织了许多农民小组，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百代表”和区的总代表。

同年八、九月间，由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任命的湖南省长

①刘东轩：衡山白果人，家贫，到水口山当矿工，一九二二年任水口山工人俱乐部副主任。一九二三年任岳北农工会主任。一九二七年任衡阳农运特派员，车江特委书记。一九二八年在祁阳做秘密工作时被捕牺牲，时年二十九岁。

②谢怀德：衡山白果人，家贫，到安源煤矿当钳工，一九二二年积极参加组织安源工人俱乐部，后被派往水口山从事工人运动。一九二三年任岳北农工会副主任。一九二五年赴郴县从事农民运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在江西萍乡牺牲，时年四十一岁。

兼湘军总司令谭延闿，率部进驻衡阳，以三民主义为号召，组织讨贼军，讨伐赵恒惕。岳北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乘谭延闿与赵恒惕进行战争的时机，经过周密的筹备，于九月中旬在白果召开了盛大的岳北农工会（加上“工”字，表示与水口山工人相联之意）成立大会，到会的有周围几十里的一万多农民。我党领导的湖南第一个农民的组织正式诞生了！

大会发表了宣言，用大量铁的事实，诉说了农民备受欺凌压榨的痛苦，指出造成这种惨状，是帝国主义、军阀和封建地主的罪恶。宣言还指出，过去不敢起来反抗，是“因为从前忘记了团结力是我们的武器”，“现在我们知道了：要为自己解除困苦，争谋利益，只有大家联合起来呵！”大会还议决了四项行动案，即：关于农民生活要如何改良之议决案、关于本会对政府态度之议决案、关于农村教育之议决案和关于农村妇女的生活要如何改良之议决案。

岳北农工会成立后，选派了代表四出演讲，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号召他们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不久，岳北数十里的农民迅速组织起来，邻近岳北的衡阳、湘乡、湘潭的农民闻风响应，纷纷加入，会员骤增到四万余人。当时农民最迫切的要求，就是阻禁平粜①。因为粮食掌握在地主手里，他们任意抬高谷价。刚收割时，一元钱可以籴谷三斗；到过年时，只能籴一斗；青黄不接时，只籴三升米，还要讲好话。农民吃尽了高价籴谷的苦头。于是，农工会决定开展平粜和阻禁地主将谷

①平粜：以平价出售谷米。

米偷运出境的斗争。他们在晓岚港用武力阻止了地主即将外运的数百担谷子，并强令地主立即以一元钱四斗五升的价格粜给农民，打响了第一炮。农民们笑逐颜开，籴谷的络绎不绝。随后，农工会捆绑并斗争了气焰嚣张不肯平粜的恶霸地主廖利元，迫使地主们减价平粜，并且酝酿着进一步开展减租减息的斗争。

新兴的有组织的农民运动起来后，以赵恒惕为首的衡山地主集团恨之入骨，阴谋策划扑灭这星星之火。于是，他们以“岳北遍地皆匪”为词，用重金千元贿赂县知事和谭延闿派驻衡山的谢国光部，捣毁了农工会，逮捕了刘东轩、谢怀德和农民积极分子数人。农民气愤已极，迅即集合七八百人，抢救农工会领袖，在白果与反动军队百余人展开了激战。农工会连夜派人赴衡阳，向谭延闿请愿。谭为了笼络人心，达到取代赵恒惕的目的，出了几张告示，表示支持农工会，并通知部下释放被捕人员。刘东轩等出狱时，从衡山县城至白果，沿途八十里，农民兴高彩烈，爆竹喧天，热烈欢迎胜利归来的领导人。农工会声威远震，岳北农民的斗争更趋高涨。但不久，谭赵战争将近结束，赵恒惕眼见岳北农民竟敢“太岁头上动土”，怒不可遏。在谭军退出衡山之后，十一月下旬，他派出反动军队一营，勾结土豪廖利元等，焚烧了岳北农工会会址和农民住房一二十栋。总代表廖炳芳、周德二、赵丙炎三人，英勇抵抗，当被枪杀。这次被捕的农工会干部和积极分子达七十余人。其中，总代表李芋邕，六十四岁了，被押解衡山监狱关了两年，始终不屈不挠，在狱中还作联自挽，表示自己的坚贞和悲愤。挽联写道：“六四岁，身首分离，是奇害、奇冤、奇诬、奇诈，只有向人

民一诉；百余里，灵魂归去，愿我妻、我子、我媳、我孙，都要报戴天之仇。”后来被折磨死于狱中。

由于当时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加上我们经验不足，没有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岳北农工会终于被敌人扼杀了。但是，岳北农民不畏强暴，敢于斗争，严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反动气焰，大长了农民群众的革命志气，他们的斗争，成了湖南农民运动的先声，激励着湖南农民继续战斗。

鉴于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军阀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罢工，造成“二七惨案”的教训，我们党采取了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内的革命民主派，一面始终坚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立场，同封建军阀进行斗争，因而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威信；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发动人民群众去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因而总是不断地失败，陷入了绝望的境地。对这个复杂的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的国民党，我们党同它的关系应当怎样呢？一九二三年六月召开的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着重讨论了这个问题。会上，以党的总书记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过分夸大中国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积极作用，认为中国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只是被联合的对象，农民不包括在革命动力之内，因此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关门主义，过分夸大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消极作用，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共产党和工人农民加入国民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多数同志，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反帝反封建的民

主主义立场，以及把国民党改组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坚决反对了上述两种错误倾向。大会决定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派遣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毛泽东同志等还提出工人阶级与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的理论，与陈独秀的反动理论相对立。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且具有反抗精神，我党不应只看到国民党，而应注意发动全国的广大农民。这一英明主张，得到多数代表赞同。大会通过的《农民问题决议案》指出：“我党第三次大会决议认为，有结合小农、佃农及雇工以反抗牵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倒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

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和推动下，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同志和李大钊同志等出席了大会，并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大会通过了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发表了以反帝反封建纲领为中心内容的宣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而正式建立了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建立，为我党造成了公开组织和教育工农群众的有利条件，推动了革命运动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国民党虽经改组，而内部的右派分子并没有被坚决清除出去，他们顽固地反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因此，统一战线能否巩固和发展，关键在于能否坚持无产阶级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而领导权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